

陳水扁選舉行為之根源 及其溢出效應

丁榕

一

民主政體下政黨領袖與民意之互動可以造成難以預想的結果，尤其在轉型期或新生的民主社會中，政黨及其領袖有相對於成熟民主社會而言更為開闊的伸展空間，而由於民眾的民主質素未達成熟階段，更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與政黨領袖的「摩西式」的引領，從而使其互動結果，往往令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感到驚訝。台灣本次大選中政黨及其領袖的策略，政黨領袖與民意之互動結果，不僅使大小兩岸三邊的政治神經受到高度觸動，也使政治學者難以用審視成熟民主社會常用的思維去審視台灣的大選。本次大選所造成的複雜局面，其根源在台灣新生民主的社會特性，以及深諳這種民主土壤的陳水扁的選戰策略與行動。陳的行為不只影響台灣選舉，其溢出效應已波及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勢。

陳水扁雖然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終維持較強勁的衝擊意識與態勢，但也一直保持着適度妥協的策略空間。每當民進黨內出現重大政策分歧時，他多次出面調和，從而達致妥協。1988年民進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針對姚嘉文將「台獨」納入黨章的提案，陳水扁適時介入，提出「如果中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在台灣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獨立」的修正案，幾個「如果」作為條件的加入，使修正案在全代會上無異議通過，成為「四·一七」決議文。1991年11月，在民進黨五全大會上，針對要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納入黨綱的提案，陳水扁提出修正案：「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①交由民眾選擇決定是一項明智的妥協。陳水扁上台時宣示「四不一沒有」（不宣布台獨、不更改國號、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問題），申明推行「新中間路線」，在拒絕「一中」的同時，又提出「統合論」。無論在「三通」、開放「戒急用忍」，直到邀請江澤民「喝茶」等問題上，仍可見其走中間路線的嘗試。因此，在選戰激烈階段，陳水扁突然大幅度地轉移，拋棄「新中間路線」，直到一再顯示挑戰中國大陸紅線的行為，其背後原因值得深究。

台灣大選所造成的複雜局面，其根源在台灣新生民主的社會特性，以及陳水扁的選戰策略與行動。陳的行為不只影響台灣選舉，其溢出效應已波及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勢。陳水扁在其政治生涯一直保持着適度妥協的策略空間。因此，在選戰激烈階段，陳突然大幅度地轉移，一再挑戰中國大陸的紅線，其背後原因值得深究。

二

台灣政黨權力結構是促使陳水扁轉變策略的基本因素。陳借助於國民黨的分裂取勝，但泛藍陣營的重新整合使台灣政黨的權力結構明顯不利於陳水扁的連任，如果不打破這種結構，陳水扁將處於宿命般的絕望境地。2003年2月14日，連戰在情人節迎「親」後，民調顯示對泛藍的支持率大大超過對陳的支持。在傾向維持現狀的中間選民居多的情況下，若採取循序漸進的溫和選戰策略，在民進黨執政乏力、示威不斷、民怨載道的情況下，等於將政權拱手讓與泛藍，唯一辦法是打破這種政黨權力結構對選舉的制約。而打破這種制約的最有效辦法，是在統獨問題上製造衝擊。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 認為^②：

每個政黨都有相當部分的選民認同於其他黨的價值標準，這一事實迫使每個黨的領導人當其執政時向另一黨作出讓步，而其在野時，則向其支持者提出希望得到急需的支持。

2003年泛藍陣營的重新整合，明顯不利於陳水扁的連任。民進黨若採取循序漸進的溫和選戰策略，等於將政權拱手讓與泛藍，打破這種政黨權力結構對選舉的制約的有效辦法，是在統獨問題上製造衝擊。陳拋出「一邊一國」、「公投」等議題，旨在爭取中間選民和泛藍中部分選民的支持。

向泛藍選民讓步只會有利於泛藍勢力而無力改變權力結構的制約，因此，必須採用後面的方法，雖然沒有在野，但在被取代的風險壓力下，陳不僅需要激起其基本支持者的支持，還要爭取中間選民和泛藍中部分選民的支持，這其中能夠支持陳的，就在於凸顯台灣的主體性，喚醒「台灣意識」。陳拋出「一邊一國」、「公投」等議題，喚起了泛藍陣營和中間選民中具有相同理念的人，雖然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或者政黨屬性上仍屬泛藍或泛藍支持者，但隨着這種選題的熾熱化，顯示出這類議題的價值上揚和將經濟等議題的價值貶值，「形而上」對「形而下」，「高級政治」抑制「低級政治」。這有可能使這類選民倒向陳或認同陳。

台灣作為新生的民主政體，具有兩個基礎性特點，其一是，由於弱勢政權面臨巨大的民意壓力，因而不得不順應民粹，並且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不僅轉移對執政的不滿，而且凝聚更多的支持力量，增添弱勢政權的合法性資源。曼斯菲爾德 (Edward D. Mansfield) 和斯奈德 (Jack Snyder) 認為，新生的民主國家被認為頗有可能捲入對外衝突之中。這是新的精英階層地位脆弱的結果，他們被迫順應民族主義的訴求以鞏固其薄弱的地位^③。國際政治中對「民主和平論」持批評意見的學者認為，快速的民主化可能會導致弱勢政權，他們不能實行有效的控制和建立政治秩序。事實上，穩定的威權政權比處於民主轉型中的政權更少傾向於誘發衝突及使衝突升級為戰爭。同樣，新生的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可能更依賴於大眾的支持。由於缺乏制度和公民社會傳統，這些領導人往往屈服於民粹的壓力，而只強調短期的政治支持。因此，民主化常伴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據觀察，東歐民主化轉型中已出現了「仇恨自由」的現象。在這種狀態下，戰爭常常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民粹主義政客可能利用外部的侵略作為強化政治支持的辦法^④。由於台灣與大陸的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上的巨大落差，台灣政客不可能挑動戰爭，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採取原理相同的政策。陳水扁對大陸的挑釁和作出「踩紅線」的姿態，就顯示自身試圖借助於與外部的衝突，特別是大陸的「侵略」態勢以激起民粹的政治支持。陳水扁是弱勢總統，儘管民進黨在

2001年大選中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但國親組合而成的泛藍力量仍佔據多數席位，而在整個台灣社會的結構中，泛藍的基本盤又超過民進黨。弱勢政党和弱勢總統，採取了新生民主政體中政客常用的辦法，即使沒有大陸的「威脅」，在這樣一種弱勢下，陳水扁也要試圖製造外部危機以凝聚民粹和獲取更多合法性資源。從整個大選過程看，北京一直保持觀望、善意和寬容的姿態，力圖避免上次那樣成為「助選員」，但陳的行為顯示他在弱勢狀態下必須採取製造外部危機的策略和辦法。

其二是新生民主社會中，民眾民主素養之不足及民意的簡單化傾向。無庸諱言，台灣民眾的民主素養和公民意識尚待提高。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其民意的成熟性和理性仍有諸多不足，尤其是南部民眾由於經濟、教育上的差距而更明顯。這種不成熟的民意特點使台灣民眾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而政客也利用這種特點，用簡單化的口號贏取他們的支持。這不僅體現在對大陸的「妖魔化」，對統一與大陸要瓜分台灣財產的錯誤連帶等荒謬宣傳上，而且體現在一些迷信行為上，突出表現在陳水扁報名參選日，民進黨一些人宣稱「天生異象」。民進黨對民眾了解甚深，以「天生異象」為陳造勢，顯示台灣民眾心理上的不足。更為突出的是，台灣政客如陳水扁可能不斷地搖擺，提出前後矛盾的選舉口號，卻依然能獲得不少支持。陳一會兒宣稱「四不一沒有」，但選舉期間又稱「四不一沒有」早已不存在；關於「公投」的內容與形式也是一變再變。如此等等，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幾乎難以得到選民的同情、理解與支持。朝令夕改、責任推委及善變是一大忌，將失去可信度。在那樣的民主社會中，如果採用陳的策略，可能失去民眾的信任。台灣民主的這一特點，卻為陳製造和變換議題，也為他引領民眾接受簡單化的觀點，創造了民意的氛圍和基礎。

從上述台灣社會特性中引申出另一個特點，即民粹表像下的精英主導性。台灣社會和政治精英一方面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壓力，包括前述作為弱勢總統的陳水扁在民意壓力下的一些策略與行為。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台灣民眾的民主成熟度仍處於發展階段，並且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因而台灣精英人物在引領台灣民意上具有主導性。在精英與民意的互動中，精英雖反映主流民意，但也在不斷地建構和引領民意。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選民的理性比較成熟，政治精英試圖引領民意的努力會受到諸多抑制，引領和重新建構民意的空間不多，除非發生「珍珠港事件」或「九一一」恐怖襲擊這樣的重大事變。但在台灣，大陸官員在某一場合的即興講話和行為，就可以被台灣精英用於建構和宣揚其「台獨」理念。在中國大陸經濟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台灣民眾對大陸仍有如此強烈的排斥意識且漸行漸遠，除了長期隔絕等因素外，政治精英引領民意的成功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主流精英在與民意互動中所具有的主導性優勢，也是促使陳水扁採用激進選舉行為與策略的一大因素。多伊奇(Karl Deutsch)認為輿論形成過程是呈瀑布模式，輿論以多階級梯方式向下流淌，就像瀑布被一系列水潭切斷一樣。多伊奇認為，最上面的水潭由經濟和社會精英組成，接下來是政治和統治精英的水潭、大眾傳播媒介的水潭、輿論領袖的水潭，最後是人民大眾的水潭^⑥。輿論形成過程在每一層次上都有被打斷和改造的可能空

由於台灣民眾的民主成熟度仍處於發展中階段，並且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因而台灣精英人物在引領台灣民意上具有主導性。大陸官員在某一場合的即興講話和行為，就可以被台灣精英用於建構和宣揚其「台獨」理念。台灣民眾對大陸有如此強烈的排斥意識，除了長期隔絕等因素外，政治精英引領民意的成功也是重要因素。

間，各層次之間有向下的流淌、衝擊與下層對上層的向上蒸騰，但在台灣，向上蒸騰的力量不及上層精英的引領，特別是政治、傳媒精英的主導性較為突出。這種上下層的衝突、斷流、蒸騰的結果順着主流精英的意向走，而台獨意識、「一邊一國」成為具衝擊力，或上下互動的主流與靈魂。台灣媒體除《聯合報》、中廣新聞、《中央日報》外，其他媒體的「綠化」既是這種互動的結果，更因其影響力而向上影響政治精英決策，向下又引領和強化民眾的「台獨」或所謂「主體」的意識。事實上，由於陳的引領成功，導致民意的大幅度跟隨，甚至終於迫使反對黨在「公投」、「一邊一國」、「台獨」等問題上也隨其起舞，並實質性地接受其主張。立法院雖通過了泛藍版本的「公投法」，但留了一個口子，連戰從兩岸平行發展論轉向接受「一邊一國」，王金平表示「獨立也是一個選項」。確實已最終出現了陳自信地聲稱的「拿香跟我拜」狀況。民眾包括反對黨拿香跟陳拜，顯示了台灣政治中的精英主導特性。

陳水扁認為一定要造成衝突，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讓步。在兩岸關係上，他明顯採取「衝突、妥協、進步」原則。在公投問題上先激進地觸碰大陸底線，繼而退一步，但實質上因為通過了「公投法」留下回旋空間，使他實現了進一步的目標。他實質上迫使北京未來與台北談判時，必須接受他所建構的談判平台。

台灣政治結構和台灣作為新生民主社會的上述特性，促使陳水扁放棄其性格與行為策略中妥協的一面，而張揚其個性中固有的另一面，即進攻性。陳水扁早期學業上的突出成績，使其心理、性格與行為中具有自信、狂妄和進攻性的傾向。他在擔任台北市議員時的質詢充滿攻擊性和挑釁性，而在其擔任「立委」期間，則秉持「衝突、妥協、進步」原則。他認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輕易讓步，一定要造成衝突，多數才會知道少數力量的可貴，迫使他們讓步。他曾向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發起挑戰並取得成功。在本次大選中，他逐步放棄「新中間路線」，改採進攻性路線，遵循的是「衝突、妥協、進步」原則，無論針對反對黨，還是北京，都採取進攻性的、激發衝突的策略。尤其在兩岸關係上，他採取的明顯是進兩步退一步的蠶食策略，抵制了「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識」，抵制了「一國兩制」，最終走向「一邊一國」，在公投問題上先激進地觸碰大陸底線，繼而退一步，但實質上因為通過了「公投法」，並留下了回旋的空間，而使他實現了進一步的目標。他實質上迫使北京未來在與台北談判時，必須現實地接受他所建構的談判平台，除非北京決意採取武力統一而放棄和平統一的策略。

三

無論上述影響陳水扁選舉行為的根源中哪一種因素作用更大，都必須現實地看待陳的策略與行為所產生的效應，特別是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從選舉本身來看，選情一度出現了有利於陳水扁的變化。國親的支持度一路下滑，陳、呂與連、宋的差距逐步縮小。由於陳引領民意，具主導優勢，對手被動跟進，使陳、呂的支持率呈上升趨勢。由於泛藍基本盤比較大，實力強，泛藍如果策略應對正確，陳未必獲勝。但從選舉行為及其效應看，陳能夠將選情從絕望性差距拼至五五波，顯示了很大的成功。

陳水扁的選舉策略與行為，促使了民意中統獨意識的大調整。台灣主體意識、台灣主權獨立意識與台灣主流價值渾然一體。統獨力量在經歷前些年相對

穩定的發展之後，經過此次選戰，已加速了力量的消長，獨派蠶食了更多的資源與空間。「一邊一國」之建構基本成形，並處於持續擴張之中。民進黨對台灣民意產生了引領與主導作用。泛藍即使勝選，與大陸談判時也將面臨強大阻力，甚至可能在兩岸關係上不得不執行陳水扁的政治遺囑，以「一邊一國」作為政策主軸。台灣各種政治力量與主流民意在統獨問題上將不再呈現截然分歧，其區別僅在於策略考慮以及具體的路徑問題。如果陳水扁贏得選舉，在形式上看對兩岸現狀未必有太大衝擊，但任何兩岸的接觸談判將很難在「一個中國」的前提或框架下進行。台灣島內將不再有明顯的統獨分歧，中國國民黨將被迫「去中國化」，真正成為本土政黨。兩岸談判必須在承認實質主權對等基礎上進行。兩岸改善關係的空間仍然會存在，陳是一個可以搖擺與妥協之人，但其談判的基點將不能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必須尋找新的雙方可以模糊接受的灰色地帶，包括所謂的中程協議也應在考慮範圍。

經此選舉活動，由於台獨勢力對大陸的「妖魔化」和進行「主體建構」，「一國兩制」在台灣不僅沒有號召力，而且將基本上被拒絕。此一訴求無以引領台灣民意。台獨勢力接受建構主義的理論，認為觀念與認同是可以建構的。也就是說，台灣獨立意識，對台灣的「國家認同」都是可以重新建構起來的。事實上，台獨勢力通過「台灣生命共同體」、「兩國論」、「一邊一國」等，逐步在建構新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並已取得效果。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已大幅度下降，認為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則大幅上升。中國的和平統一面臨更大挑戰。

在正常的民主社會中，「對外關係」問題仍然是一個政策基本面的問題，競爭雙方只是宣稱自己而非對手的政策能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在台灣，對大陸的關係卻被標籤為「愛台」與「賣台」的問題，即是否「出賣」「國家利益」的問題。可見，在台灣選舉中，由於「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的存在，「對外關係」，特別是兩岸關係問題，已超越了政策基本面而成為一個獨立變量。在實質解決「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之前，這一問題將會一再誘惑台灣政客去操縱相關議題以獲取更多政治資源。當然，其有效性也須在一定的限度內，超越了此一限度，在內外壓力下，最終可能會適得其反。

此次選戰勢將加速統獨力量的消長。泛藍即使勝選，與大陸談判時也將面臨強大阻力，甚至可能不得不執行陳水扁的政治遺囑，以「一邊一國」作為政策主軸。這是由於在台灣，對大陸的關係被標籤為「愛台」與「賣台」的問題，因此，在解決「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之前，這一問題將會一再誘惑台灣政客去操縱相關議題以獲取更多政治資源。

註釋

- ① 陳峰強、范玉周：《陳水扁與台灣民進黨》（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頁294。
- ② 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1。
- ③④ Michael D. Ward and Kristian S. Gleditsch, "Democratizing fo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no. 1 (March 1998): 51-61.
- ⑤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馮克利等譯：《民主新論》（上海：東方出版社，1998），頁105。